

【伦理与道德】

应用德性论探究*

黎松 任丑

摘要:随着传统德性论的复兴与诸多现实应用伦理问题的不断出现,应用德性论的出场已是大势所趋。传统德性论是应用德性论的基础,应用德性论是扬弃传统德性论而形成的新型德性论。如果说传统德性论主要研究个人道德品质,那么应用德性论则重在思考人类命运的德性问题。也就是说,应用德性论主要研究事关人类共同命运、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重大现实伦理问题,如生态环境、基因工程、大数据等引发的德性问题。因此,应用德性论的主要价值取向应当是人类之善和共同福祉。

关键词:应用德性论;人类之善;共同福祉

中图分类号:B8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3-0751(2021)03-0088-05

目前,高新科技深刻全面地融入人类社会的历史进程,带来诸多前所未有的应用伦理领域的德性问题。传统德性论很难适应如此复杂的局面,更遑论解决应用伦理学领域的德性问题。这就要求传统德性论自我扬弃、自我提升为应用德性论,以期妥善地解决当代社会的诸多应用伦理问题。有鉴于此,亟须反思的重要问题是:应用德性论何以萌生?如何兴起?价值取向为何?

一、应用德性论萌生的根据

应用德性论并非无源之水、无本之木,其萌生的根据主要有三个层面:词源学根据、传统德性论根据和当代理论与现实根据。

1. 词源学根据

我们以“aretê”和“惠”为例,考察应用德性论萌生的词源学根据。在古希腊,德性(aretê)具有优秀、卓越、力量和功能等诸多内涵。^①“aretê”既可以指人的德性,也可以指物的德性。一个物的德性是指该物具有优秀功能或卓越能力,如马的德性在于

奔跑,笛子的德性在于动听,住房的德性是宜居。一个人的德性是其内在优秀的卓越品质。就是说,德性(“aretê”)是指人或物所具有的优秀品性。古代汉语中,表达德性的汉字是“惠”。东汉许慎的《说文解字》把“惠”训解为:“外得于人。内得于己也。”^②清代段玉裁对“惠”进一步注解为:“内得于己,谓身心所自得也。外得于人,谓惠泽使人得之也。”^③这就是说,德性既要润泽自我身心、安顿生命,又要施诸他人、惠及社会。德性不仅是内在的道德品格,而且是外在行为的实践品格。从“aretê”和“惠”的含义看,德性是指人或物具有的优秀品格和行为品格。这种词源学体现的实践或应用特质深刻地体现在传统德性论之中。

2. 传统德性论根据

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是传统德性论的典范,它为当代德性论奠定了坚实基础,也为应用德性论的出场提供了理论根源。

亚里士多德认为,“每种德性都既使得它是其德性的那事物的状态好,又使得那事物的活动完成

收稿日期:2020-03-15

*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青年项目“应用德性的深度研究”(20YJC720008);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青年项目“德性的阶梯研究”(SWU2009432)。

作者简介:黎松,男,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讲师,哲学博士(重庆 400715)。

任丑,男,西南大学国家治理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哲学博士(重庆 400715)。

得好”；“如果所有事物的德性都是这样，那么人的德性就是既使得一个人好又使得他出色地完成他的活动的品质”。^④概而言之，德性具有两个方面的内涵：一是德性作为一种内在的优秀的卓越品质，包含在事物或人自身内，表现为一种功能、力量或理性上的自足；二是德性作为一种实践性、运用性的品质，是人们在行为中持续养成并体现出来的各种优秀品质或道德品质。只有在人的实践活动中，德性（理智德性、道德德性）才能真正培养和体现出来。

亚里士多德把德性的实践活动或应用活动扩展为德性的序列。他把公正作为一切德性之总纲：“公正最为完全，因为它是交往行为上的总体的德性。它是完全的，因为具有公正德性的人不仅能对他自身运用其德性，而且还能对邻人运用其德性。”^⑤公正主要包括个人公正和社会公正。个人公正就是对自身和他人的公正，社会公正或城邦公正就是对社会中的人、整个社会与城邦的公正。可见，公正德性的应用性特征早已蕴含在亚里士多德的德性思想中。一旦进入应用伦理学领域，公正即可从城邦的狭小领域进入人类领域的制度等社会环节，进而自我扬弃、自我提升为应用德性范畴的德性。

3. 当代理论与现实根据

整体而言，亚里士多德之后，传统德性论在广度和深度上都有较大的发展，但是并没有超出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范畴。近代规范伦理学（主要有康德道义论、密尔功利论等）兴起后，传统德性论几乎成为伦理学的边沿话题。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以来，麦金太尔等学者主张回到亚里士多德的德性论。麦金太尔认为德性是一个不断发展的实践进程，“我们从原初动物状态发展为独立的理性主体所需要的德性，我们面对并回应自我及他者的脆弱性与无能所需要的德性，属于一个同样系列的德性”^⑥。更为重要的是，德性只有在一定共同体中才有可能产生，“个人的美德是在其所处社群中形成的，形成这种美德的实践活动是人与人之间的合作活动”^⑦。如果说麦金太尔主要关注个人德性并涉及共同体德性，那么罗尔斯主要致力于共同体的德性研究，力图把亚里士多德式的城邦公正改造提升为社会制度的正义。罗尔斯主张，运用正义的两个原则确保社会安排和社会制度设计的正义性：第一个原则，每个人对与所有人所拥有的最广泛平等的基本自由体系相容的类似自由体

系都应有一种平等的权利。第二个原则，社会和经济的不平等应这样安排，使它们在与正义的储存原则一致的情况下，适合于最少受惠者的最大利益；并且，依系于在机会公平平等的条件下职务和地位向所有人开放。^⑧在罗尔斯这里，正义德性已经不再囿于个体品格，而是进一步拓展和运用到制度层面，涉及和每个人相关的制度德性问题。罗尔斯说：“正义是社会制度的首要价值，正像真理是思想体系的首要价值一样。”^⑨实际上，这里的“首要价值”（the first virtue）就是第一德性。就此而言，罗尔斯《正义论》中的正义，作为制度的第一德性，已经属于应用德性范畴。

与社会制度类似，科技应用涉及所有人的生存发展，深刻地影响着人类的历史进程。亚里士多德早就提出了与科技相关的理智德性的概念。他说：“德性分两种：理智德性和道德德性。理智德性主要通过教导而发生和发展，所以需要经验和时间。道德德性则通过习惯养成。”^⑩可以说，理智德性是科技德性的基础和萌芽。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亚里士多德的理智德性已经涉及科技德性的萌芽，但是他没有也不可能真正展开科技德性的深刻全面的研究。科技德性关涉人类命运前途，是典型的应用伦理领域的应用德性。虽然科学技术对人类发展至关重要，但是只懂得科技是不够的，还应当追寻科技德性。爱因斯坦说：“关心人的本身，应当始终成为一切技术上奋斗的主要目标；关心怎样组织人的劳动和产品分配这样一些尚未解决的重大问题，用以保证我们科学思想的成果会造福于人类，而不致成为祸害。”^⑪随着医疗技术、生物科技、基因工程等高新技术的迅速发展，诸多全新的应用伦理问题随之出现。这些新的伦理问题，超出了传统德性论的范畴。高新科技时代，应用伦理学的一个重要历史使命是在理智德性基础上推进科技德性的研究和实践。

可以说，应用德性论根源于传统德性论，却又不同于传统德性论，是否定和扬弃传统德性论的新型德性论。

二、应用德性论的兴起

传统德性论很难在当前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发挥作用，亟须进入应用伦理学领域，把自身提升为应用德性论。与此同时，诸多事关人类命运的现实应用伦理问题更加迫切地要求应用德性论的出场。马尔

腾说：“现在，随着全球运输、通信以及经济的全球化，人们的社会体系正在变成单一的全球性社会体系，地球的生态系统正在通过人类活动紧密联系在一起。人口和社会复杂性的增长在全球每一个城市的生态系统和社会系统中史无前例地同步发生了。”^⑫全球性社会体系的形成正是应用德性论兴起的重要现实根据，也是推动应用德性论研究的根本动力。

1. 应用德性论兴起的外国图景

20 世纪 70 年代，应用伦理学在美国兴起。随后，应用伦理学在欧洲乃至全球声名鹊起，逐步成为哲学领域的显学。在此过程中，德性与应用伦理学的关系问题也就成为学者们思考研究的对象和目标。1990 年，詹姆斯·多纳休发表《德性和品格在应用伦理学中的运用》一文。他通过案例分析，认为德性伦理有助于人们在应用伦理问题中做出正确的道德抉择。^⑬2002 年，利兹尔·范兹尔在《德性理论与应用伦理》一文中，探讨了德性理论与应用伦理的辩证关系。他认为，许多学者误解了传统德性论，误以为德性论只关注人的品格而不关注人的行为。他从正确的行动、道德生活的敏感性和普遍原则的利他性三个方面，论证了德性伦理不仅指向品格还指向行为。^⑭这表明，德性伦理能够在应用伦理的复杂场景中发挥出它应有的价值。2012 年，盖伊·阿克塞尔和菲利普·奥尔森在《应用德性伦理的最新研究》一文中认为，应用伦理学已经成为伦理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德性伦理所追求的是“我应该成为一个怎样的人”，这种主体善的观念、道德判断和对整个生活的特定倾向，有助于许多应用伦理问题的解决。他们进一步提出构建应用德性论范畴的环境德性和公共德性的思想。^⑮之后，应用德性论的研究逐渐拓展到技术德性、环境德性和组织德性等研究领域。

2. 应用德性论兴起的中国画卷

20 世纪 80 年代伊始，应用伦理学在中国兴起。中国社会科学院应用伦理研究中心成立，其他科研单位或高等院校也相继成立应用伦理学科研机构。当前，应用伦理学的研究如火如荼，业已成为名副其实的哲学学科之显学。应用德性的观念在应用伦理学的进程中孕育发展。21 世纪初，应用德性论的思想脱颖而出。在众多学者关于应用伦理学研究的坚实基础上，2011 年，任丑发表《传统德性论的困境及

其出路》《应用德性论及其价值基准》两篇论文。他在反思传统德性论的困境问题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应用德性论的概念，较为系统地探讨了传统德性论与应用德性论在德性的问题视域、德性的理论性质、德性的实践特质三个方面的异同，诠释了应用德性论的观念，论证了应用德性的价值基准。^⑯2015 年，闫茂伟在《德性伦理应用于企业的合理性及其建构》一文中探讨了德性的应用性和应用德性的内涵，认为“德性伦理学的应用性也是德性伦理学的内在特质之一，德性伦理学本身也具有研究和应用的双重任务”^⑰。另外，还有诸多学者从不同角度间接或直接涉及应用德性的相关问题。兹不赘述。

3. 应用德性论兴起的管窥蠡测

21 世纪初，国内外学者几乎同时提出并论证了应用德性论的有关问题，对应用德性论进行了有益的初步探索。我们可以据此对应用德性论进行“管窥蠡测”，以期推进有关研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传统德性论是理论伦理学领域的德性论，主要关注个体自身的道德修养和个体领域的道德品质，追求自身内在的高尚品格（如儒家的仁义礼智信，古希腊的节制、勇敢、智慧、公正等）。不过，这并不是说传统德性论与公共问题毫不相干。问题的关键在于，传统德性论的理论和实践不可能涉及应用伦理学领域的实质问题如网络信息、大数据、生物工程、全球正义等。这些应用伦理问题正是应用德性论的理论和实践对象。是故，应用德性论并不是简单地把传统德性论应用于具体的社会实践领域的理论，而是应用伦理学领域的德性论。

应用伦理学大致可分为物理应用伦理学和人理应用伦理学。物理应用伦理学主要指科技领域的应用伦理学，如生命伦理学、人工智能伦理学、基因伦理学等。人理应用伦理学主要指人文社会科学领域的应用伦理学如政治伦理学、法律伦理学、管理伦理学等。^⑱与此相应，应用德性论也主要包括物理应用德性论和人理应用德性论。前述科技德性、制度德性分别是物理应用德性论、人理应用德性论的典范。应用德性论直面关涉人类全局的应用伦理问题如生态环境、生命科学、全球公正等，是主要研究关涉人类命运和历史进程的伦理问题的新型德性论。

显而易见，应用德性论兴起的背后，存在着其内在理性的价值诉求。或者说，后者正是应用德性论兴起的根据和根源所在。

三、应用德性论的价值取向

如果说传统德性论注重个人的道德品质与个体道德行为,主要关注个体善和个体幸福等价值问题,那么应用德性论则致力于人类命运的共同价值问题。正因如此,应用德性论的主要价值取向应当是人类之善和共同福祉。

1. 人类之善

善是伦理学的核心概念,是判断道德行为的基本价值标准。亚里士多德认为,“每种技艺与研究,同样地,人的每种实践与选择,都以某种善为目的。所以有人就说,所有事物都以善为目的”^{①9}。善必然是为了一定目的,没有目的的善不是善。就德性与最高善的关系而言,“最高善的每个范围都需要所有德性,每种德性都渗透于最高善的所有范围”^{②0}。同理,应用德性与善密不可分,追寻人类之善是应用德性论的内在诉求。

人是社会性动物,个体活动必须在社会活动中进行,并体现为类生活。马克思说:“个体是**社会存在物**。因此,他的生命表现,即使不采取共同的、同他人一起完成的生命表现这种直接形式,也是**社会生活的表现和确证**。人的个体生活和类生活不是**各不相同的**,尽管个体生活的存在方式是——必然是——类生活的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方式,而类生活是较为特殊的或者较为普遍的个体生活。”^{②1}如果说个体生活是传统德性论的基础,那么类生活则是应用德性论的基础。是故,应用德性关注人类社会公共领域的伦理问题,寻求人类之善。

我们以环境问题为例。在传统德性论看来,环境属于自然,属工具性范畴,环境本身不具有德性。随着当代社会的快速发展和高新科技的日益进步,人们对环境的认识由以往的自然环境上升为伦理生态,人的德性相应地转变为环境德性或生态德性。^{②2}环境德性属于应用德性范畴,它应当关注生态平衡、健康与和谐发展问题,寻求自然环境的美好以及整个社会的繁荣发展。马克思说:“只有在社会中,人的**自然的存在对他来说才是人的合乎人性的存在**,并且自然界对他来说才成为人。因此,**社会是人同自然界的完成了的本质的统一**,是自然界的真正复活,是人的实现了的自然主义和自然界的实现了的人道主义。”^{②3}可见,应对自然与人关系的环境德性本质上依然是人的德性,它涉及应用德性的最为根

本的要求:对生命价值的关注,而生命价值则是善的本质规定。在施韦泽看来,“善是保存和促进生命;恶是毁灭和阻碍生命。事实上,在对人际行为的伦理评价中,通常被认为是善的一切,都归结为对人类生命的物质的和精神的保存或促进,以及对实现人类生命的最高价值的追求。反过来说,在人际行为中被认为是恶的一切,就其本质而言,都是对人类生命的物质的或精神的毁灭或阻碍,以及对实现人类生命最高价值的追求的疏忽”^{②4}。一般意义上说,应用德性(包括环境德性)的基本要素是:保存人类生命,避免人类生命受到威胁和伤害;在此前提下,保存其他生命,避免其他生命受到威胁和伤害。应用德性追求人类整体的善以及生命善,这就决定了其具体内涵是共同福祉而非特殊的或偶然的福祉。

2. 共同福祉

传统德性论立足建立和完善个体内在道德品质,强调个体内在价值的建立和实现,主要追求个体价值如个人的自律、中道、勇敢、节制、智慧等德性。传统德性论的基本观念可以归纳为:德性是伦理性在个人性格中的反映,是社会环境对个体品格及其价值的塑造的伦理成就,主要关注个人品格的养成和实践,以个体幸福为主要价值取向。

传统德性论对幸福进行了严肃深刻的反思。亚里士多德认为,幸福是道德德性或行为德性的目的,是应当追求和达到的最高目的和至善。幸福与快乐相关,最高的幸福则是哲学的沉思。获得幸福,就要去做灵魂的合乎德性的实践活动。^{②5}康德在道德形而上学的层面深刻诠释了幸福和德性的关系,德性是属于本体领域的自由本质,幸福则是属于现象世界的必然现象。德性是自律范畴,而幸福则属于他律范畴。这就会出现德性和幸福不一致的问题。至善则应当是幸福与德性的一致,应当是德福一致的先天综合判断。康德说:“既然德行和幸福一起构成一个人对至善的占有,但与此同时,幸福在完全精确地按照与德性的比例(作为个人的价值及其配享幸福的资格)来分配时,也构成一个可能世界的至善:那么这种至善就意味着整体,意味着完满的善,然而德行在其中始终作为条件而是至上的善。”^{②6}至善是德性与幸福的统一,只有拥有德性,才能配享幸福。总体上讲,在德性与幸福的讨论中,传统德性论的基点是个体的德性,涉及的主要是个体的幸福。当然,这仅仅是指传统德性的总体价值取向,并不是指传

统德性论毫不关注共同福祉问题。

应用德性论的重心不是传统德性论对于个人道德品质的构建,而是追求人类实践的卓越优异,试图在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实践中,追求人类福祉。习近平指出,目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革命正在孕育成长”^{②⑦}。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面临着世界多元与全球共存两大总体趋势:一是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社会信息化、文化多样化持续推进;二是各国相互联系、相互依存,全球命运与共、休戚相关。应用德性论的重心从传统个体德性转向事关人类命运的整体德性或人类德性,涉及人类命运共同体和人类整体利益。

在应用德性论与幸福论的关系问题上,应用德性论从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寻求人类整体的幸福。就是说,应用德性论关涉的领域和解决的问题主要是当前社会复杂的、现实的、整体性的伦理冲突,目的是实现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幸福。就人与自然的关系来说,每一个地区、每一个国家都应该与其他地区、其他国家进行沟通协作,建立有效的共同治理与防治机制。马尔腾说:“我们有理由与自然合作,让自然为我们服务,而不是与自然斗争。”^{②⑧}为此,应用德性要求把每一个国家和地区当作一个应用伦理主体,肩负起保护整个环境的主体责任,维护整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生存环境,为人类的幸福和未来发展切实承担历史责任。

四、结语

从应用德性的萌生、兴起和价值取向来看,应用德性论是扬弃传统德性论的新型德性论。迄今为止,虽然应用德性论的研究方兴未艾,但是人类共同

命运的内在本质和实践使命决定着应用德性论必将由“星火之光”而成燎原之势。

注释

- ①[美]A.麦金太尔:《德性之后》,龚群、戴扬毅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154—155页。②③[清]段玉裁:《说文解字注》,中华书局,2013年,第507、507页。④⑤⑩⑱⑲⑳[古希腊]亚里士多德:《尼各马可伦理学》,廖申白译注,商务印书馆,2003年,第45、130、35、3—4、302—311页。⑥Alasdair MacIntyre, *Dependent Rational Animals: Why Human Beings Need the Virtues*, London: Gerald Duckworth & Co.Ltd., 2009, p.5.⑦俞可平:《社群主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第90页。⑧⑨[美]罗尔斯:《正义论》,何怀宏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8年,第302—303、3页。⑩[美]爱因斯坦:《爱因斯坦文集》第三卷,徐良英、赵中立、张宣三编译,商务印书馆,2016年,第89页。⑪⑫[英]杰拉尔德·G.马尔腾:《人类生态学——可持续发展的基本概念》,顾朝林、袁晓辉等译校,商务印书馆,2012年,第166、146页。⑬Donahue, Ja. The use of virtue and character in applied ethics. *The College Theology Society*, 1990, 17(3). ⑭Liez van Zyl. Virtue Theory and Applied Ethics. *South African Journal of Philosophy*, 2002, 21(2). ⑮Axtell G., Olson P. Recent Work in Applied Virtue Ethics. *American Philosophical Quarterly*, 2012, 49(3). ⑯任丑:《应用德性论及其价值基准》,《哲学研究》2011年第4期。⑰闫茂伟:《德性伦理应用于企业的合理性及其建构》,《华中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⑱参见任丑:《伦理学体系》,科学出版社,2016年,第166—216页。⑲Friedrich Schleiermacher, *Lectures on Philosophical Ethics*, translated by Louise Adey Huish,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2, p.101. ⑳⑳[德]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编译,人民出版社,2018年,第80—81、79—80页。㉑童建军、林晓娟:《当代西方环境德性伦理的新发展》,《自然辩证法研究》2019年第5期。㉒[法]施韦泽:《文化哲学》,陈泽环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第307页。㉓[德]康德:《实践理性批判》,邓晓芒译,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152页。㉔习近平:《论坚持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央文献出版社,2018年,第415页。

责任编辑:思 齐

An Inquiry into Applied Virtue Theory

Li Song Ren Chou

Abstract: With the revival of traditional virtue theory, many practical application ethical issues continue to emerge, the appearance of applied virtue theory has been the general trend. The traditional virtue theory is the foundation of the theory of applied virtue, and the latter is a new type of virtue theory formed by sublating the traditional virtue theory. If the traditional virtue theory mainly studies personal moral character, then the theory of applied virtue focuses on thinking about the virtue of human destiny. In other words, the applied virtue theory mainly studies the major practical ethical issues related to the common destiny of mankind and the process of human history, such as the virtue issues caused by the ecological environment, genetic engineering, and big data. Therefore, the main value orientation of applied virtue theory should be human goodness and common well-being.

Key words: applied virtue theory; human goodness; common well-being